

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

A Series of Bilingual English / Chinese Humanities Textbooks

丛书主编 / 孙 逊 孙景尧



宋莉华 / 编著

*A Stud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inology Classics*

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

上海教育出版社

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

A Series of Bilingual English / Chinese Humanities Textbooks

丛书主编 / 孙 逊 孙景尧

宋莉华 / 编著

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 / 宋莉华编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6

(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孙逊, 孙景尧主编)

ISBN 978-7-5444-2729-6

I. ①当... II. ①宋... III. ①汉学—研究—西方国家—双语教学—高等学校—教材—英、汉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9235 号

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

宋莉华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江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19.75 插页 1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 本

ISBN 978-7-5444-2729-6/H · 0131 定价: 34.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

编委会名单

丛书主编：

- 孙 逊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孙景尧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编 委：

- 乐黛云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刘象愚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杨慧林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吴伟克(Galal Walker) 美国东亚语言资源中心主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
简小滨 美国教育部中文旗舰项目驻华办事处主任
丁尔苏 国际符号学学会特邀理事、香港岭南大学英文系教授
黄铁池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总序

Preface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我国掀起了一股持久的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化的热潮,大学外语类专业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首选。这股“外语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而且至今也还没有成为过去。

但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当今世界又开始涌动学习汉语的热潮,大学对外汉语专业也随之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外语和汉语,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向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球范围内相竞相生,相激相荡。

面对世界的“汉语热”,我国大学中文系的使命何在?这是摆在大学中文系师生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我们当然有理由为世界的“汉语热”感到自豪,但我们更不能放松和忘记的是自身的母语学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普及。大学中文系,顾名思义,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学术殿堂。教好、学好母语和中国文学,是中文系师生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不可否认,由于“外语热”的持续升温,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母语的学习有放松和忽略的迹象:好像这年头,只要学好了外语,就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而中国人懂汉语是自然习得的,汉语还有什么好学的?以致各种语法、文字错误满天飞。与汉语学习同样存在问题的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本国传统的东西不感兴趣,文学和影视作品喜欢外国的,连过节也爱过洋节日;课堂教学和课外阅读只背文学基本原理和文学史,记住一些条条杠杠,或只读“图”,不读书,要读也读一些时尚流行书。凡此种种,都是当前大学中文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此,我们可透过世界的“汉语热”,反观汉语和中国文化学习的重要性,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明白:自己首先要尊重本国的语言文学和文化,即使是中国人,要学好中文也是不容易的,通晓中国文化更是艰巨。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精心的课程设置,确保大学中文系学生学好中文、精通中文;同时,也需要同学们刻苦读书,多读经典、多读原著,要想学好中文,必须有几部中国文化的原典在肚子里打底。

在引导学生学好母语和中国文化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忽略对外语与外国文化

的学习。我们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与外部世界交流和沟通,是培养不出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专门人才的。因此,在学好母语和中国文化的同时,学好外语和外国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就涉及双语教学和多元文化的学习问题。有一个时期,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母语还没有学好,搞什么双语教学?认为双语教学根本就没有必要。直到今天,也还不时可以听到这类议论。其实,即便是中文系学生,会讲外语,能够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不懂外语也可教对外汉语,但会讲外语的对外汉语老师肯定会更受欢迎,这里有个高下之别、文野之别、粗细之别。即使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会讲外语,粗知一些外国文化也会使你如虎添翼。特别是随着我国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跨国公司、大型企业和重点中学都需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专业人才。至于有些人担心:母语还没有学好,如何能学好外语?这也是多余的,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学者和今天年轻的专业人士都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只是语言文化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永无止境,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尽善尽美,但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

中文学科是一个有着悠久学术传统和积淀的学科,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着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今后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时代在飞速发展,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既为大学中文系的办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正可在继承以往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探索一条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和需求的办学路子,其中包括:如何更好地夯实汉语言文学的基础,引导学生认真地阅读原著和原典,而不是只会死记硬背文学基本原理和文学史里的一些条条杠杠;如何引导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学好外语,精心设置一套适合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双语教材和课程,培养学生成为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汉语言文学工作者;以及如何在实践、实习环节,组织学生在不走出国门的前提下,通过参与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服务工作,通过国际合作办学中的远程网络教学,锻炼学生的实战能力。总之,大学中文系如何更好地适应世界“汉语热”而调整办学思路,这方面正有着大量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大学中文系承担着传承和传播汉语言文化的历史使命。如果说,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使我们的先辈徒有满腹经纶,无法实现他们的抱负;改革开放前的闭关自锁又使我们缚住了自己的手脚,坐失了许多与世界文化交流与交融的良机;那么今天,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兴盛,终于使我们迎来了这千载难逢的一次历史性机遇。作为个中之人,我们既由衷地感到自豪,更真切地感到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正是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在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尝试编写这套“大学文科英汉双语教材系列”。它与通常的英语教材或中文教材的不同之处是,重在“研读”且又是“双语”对照。这里的“双语”,就是教材的文本是英文原著,在原文旁加上中

文批注,以起到导读英文原著的作用;所谓“研读”,就是借助解读分析英语原文,着力于直接具体地领会并“拿来”西方作家与学者的运思过程、表述特点、传统心理、价值观念和美学思想等传统文化精神,以便既能从中学习研究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能有效提高沟通“自我”与“他者”的能力。这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考虑到当下教学的实际需要,即对大多数中文系学生来说,他们经过长达十来年的英语学习,并又过了英语的四级和六级考试,理应在阅读英文原著方面不成问题。然而,根据多年教学实践,我们遗憾地发现,不少学生很少或很不善于阅读英文原著,尤其是学术论著。这是因为,一方面同他们经历了多年应试教育而形成的惯式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他们未能适应和掌握大学自学和治学规律所致,而缺乏阅读研究学术论著的具体方法指导和实践训练,则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这套由8本组成的系列双语教材,即《英美诗歌名篇研读》、《欧美散文名篇研读》、《欧美小说名篇研读》、《西方古典文论要著研读》、《西方现当代文论要著研读》、《西方比较文学要著研读》、《当代欧美汉学要著研读》和《当代西方语言学要著研读》,既有文学作品,又有语言学和文学的理论和研究论著,并同课程设置的主干课程配套。

本书的编写体例和使用方法,由于同一般著作不太一样,因此也须略作说明。在每篇正文之前,均有导读,对作者及其事业专长、主要贡献,对选文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意义等,以中文予以简要介绍。书中英语正文旁,都有中文的批点:或对原文的论点论旨论据,逻辑论述的层次结构,所用的方法和特点等,予以点评或解释;或对作品的思想观念,艺术魅力,情节结构,感情抒写和写作技巧等,予以评论和赏析,以起导读深究作用。对原文难句、难词的翻译或解释,均放在每页的脚注;而原文的原注也一概附上,以供读者查阅参考。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我们先给研究生编选了《比较文学经典要著研读》并讲授此课,后又扩大到本科生的多门课程。十多年来,我们和学生们都感到教学相长,双赢互益。有些高校同行闻讯之后,来人或来函索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欣然愿意帮助出版,以供教学参考和传播之用。我们在此十分感谢大家的关心与支持,但我们又深知本书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还有因我们水平所限而难以克服的差错,我们真诚祈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孙 逊 孙景尧

2009年10月于上海

前言

Foreword

汉学研究源远流长,19世纪在欧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得到迅速发展。汉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学养,推动了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汉学研究进行跨语种的文化研究与文化诠释,有助于我们借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是我们进行学术范式转换的重要参照和途径。事实上,其研究成果已经对中国学术传统的重建与改造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余英时《海外汉学研究: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研究和发展的历史》序)

海外汉学(对“汉学”一词的界定,学界尚存争议,本书泛指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学术对象,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因而本书的选目让编者颇为踌躇。考虑到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本书的教材用途,编者遵循了以下原则:以文章的学术品位和创见性为衡量标准,选取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的代表作品。同时,配合学生的实际学习进程和知识结构,先选取两篇关于海外汉学的具有总论性质的文章,后大致按照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轨迹,使所选论著能够涵盖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体和主要文学成就。另外,所选内容偏重文学,适当地兼顾文化、历史与哲学著作。因为许多著作虽然不属于文学范畴,但它们已跨越学科界限,成为必须阅读的经典,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深深地影响着中国读者。

海外汉学的学术气质和研究手段都与国内学者大相径庭,本书凸显了各国汉学研究的特点。马伯乐的《道教与中国宗教》体现了曾在旧式汉学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法国汉学的特点,即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功底。马伯乐与同时代及以前的汉学家相比,对原始文献的掌握无人企及。德国汉学的优势则是思想和理论的深度。韦伯尽管不通中文,也不能算作汉学家,却被誉为“伟大的外行”。他的《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对儒教与道教的研究极具挑战性。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学术命题和理论框架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给我们以启示。而美国汉学后来居上,二战后成为新的汉学中心。费正清被称为“当代中国学研究之父”,本书选录了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他的“冲击回应”的研究模式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



现。宇文所安擅长以全局的眼光对诗歌进行系统的理解,浦安迪以叙事学理论研究著称,韩南则以严谨的考据见长,他们的成果体现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汉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学术课题,如现代性的问题。韦伯试图通过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工业的现代化。王德威《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则希望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上有所突破。海外汉学也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密切联系,在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性上很值得我们借鉴。葛兰言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研究,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使汉学研究发扬光大。何谷理从经济、技术层面研究明清小说的插图、读者群,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思路,有助于我们厘清小说传播的轨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拓荒式的著作,作者完全根据自己的眼光为现代小说家们排序,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认识,使张爱玲、钱钟书的《围城》等过去不受关注的作家和作品被重新发现。此书不仅使夏志清跻身欧美著名批评家之列,而且影响了后来数十年的华语文学史观。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学术的发展,许多论著中的观点或材料已不足据,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我们应该将其置于作者写作的时代与文化语境,将汉学的嬗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量,客观评价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如费正清受到冷战思维模式的影响,葛兰言和韦伯在文献引征上存在的问题等。

本书是为适应双语教学的需要,为中文系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编纂的当代海外汉学名著的选本。考虑到学生实际的语言结构,仅选取欧美汉学家的英语著作或有英译本的著作,以“二战”以后的论著为主。日本汉学成就卓著,但编者个人以为它与欧美汉学属于不同体系,故本书未收录日本汉学家的著作。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力求将广博的视野与深入细致的分析相结合。编排体例,包括导读、评论、注释(其中尾注主要是根据原文中的注释标明引文出处,当页注是解释、说明性的文字,也部分地参考了原文注释)和思考题。这样,既有对海外汉学研究状况的历史轨迹的勾勒,使学生对海外汉学史有总体了解;同时,又通过细读文本,提高学生阅读英语原著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学术视野,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本书的选文保持了相对完整,某些篇幅对于授课而言,可能略嫌冗长,教师可视具体情形进行节选。

“‘横看成岭侧成峰’,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式,探讨古老而又常青的中华文明,在学术上相互切磋,将推动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有益于在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世界文明的建设。”(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引言》)希望本书的选编有助于此。然而,囿于编者个人的局限和学术眼光,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宋莉华

2009年秋于沪上

目 录

Contents

Foreword	...	1
前言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ohn King Fairbank	... 1
美国与中国	[美] 费正清	
Sinology at German University	Herbert Franke	... 12
德国大学中的汉学	[德] 傅海波	
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Max Weber	... 33
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	[德] 马克斯·韦伯	
T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Henri Maspéro	... 57
道教与中国宗教	[法] 马伯乐	
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	Marcel Granet	... 78
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	[法] 葛兰言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Stephen Owen	... 93
盛唐诗	[美] 宇文所安	
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 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	James J. Y. Liu	... 109
李商隐的诗	[美] 刘若愚	
The Origin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Hua-pen	Jaroslav Průšek	... 121
话本的起源及其作者	[捷克] 普实克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Jacques Gernet	... 140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	[法] 谢和耐	



The Chinese Vernacular Novels 中国白话小说史	Patrick Hanan [美] 韩南	... 160
A Pilgrimage in Seventeenth-Century Fiction: Taishan and the Xing Shi Yin Yuan Zhuan 17 世纪小说中的一次进香: 泰山与《醒世姻缘传》	Glen Dudbridge [英] 杜德桥	... 200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中国叙事文学批评理论初探	Andrew H. Plaks [美] 浦安迪	... 220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中华帝国晚期插图本小说阅读	Robert E. Hegel [美] 何谷理	... 242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	[美] 王德威	... 267
A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中国现代小说史	[美] 夏志清	... 287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

【导读】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之父”、“头号中国通”。美国《评论》杂志指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他的研究不仅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乃至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费正清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作为狭义的汉学家的范畴,他的目标既是学术的,又超越了学术。费正清的代表著作主要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剑桥中国史》、《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中国新史》、《中国对西方之回应》(与邓嗣禹合著)等。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中西文明的冲突,是费正清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核心。费正清认为:“西方是19世纪和20世纪震撼全球技术进步及其他种种进步的摇篮和发明者,因而能够从自身的文明中完成近代化……而中国由于自身独特的传统,则只能借助外部力量实现现代化。”根据他的观点,中国要完成近代化的进程,必须借助来自西方的冲击,这样,费正清构筑了“冲击—回应”的模式来考察近代的中西关系。这个思维框架由来已久,不同于前人的是,费正清强调了这种模式的文化视角。它包含着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的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这同时意味着另一重假设,即在这段中国历史中,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较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

1948年问世的《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后来经过三次修订、再版,总销量30多万册,成为有关中国的最畅销的西方著作之一,给费正清带来极大的声誉。该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叙述西方入侵之前中国古代社会和政治的一般特征。第二部分描写欧美列强入侵中国后产生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与中国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部分是有关中美关系的发展。这部著作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很显然就是冲击—回应模式。

尽管作为严肃的学术分析框架,冲击—回应模式在20世纪50与60年代影响最大,但是它对教科书和其他大学教学资料的影响至今不衰。然而在经过越南战



争及水门事件的震动后,美国史学界对由费正清确立的这一研究模式提出了质疑。以柯文(Paul A. Cohen)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的发展道路与方向产生怀疑,并由此向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过程中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进行挑战。柯文指出:冲击—回应模式,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上,很容易鼓励人们把并不仅仅是,或主要并不是对西方作出回应的发展错误地解释为是对西方作出的反应。此外,它还促使史学家认为凡是和西方入侵没有明显联系的中国近代史的各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

China's Impact on Europe

Europe was the aggressor in opening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impact of the new relations was therefore felt first in Europe. This is really no paradox, for the responsiveness to stimuli which led Europeans overseas made them sensitive to what they found there. Until a century and a half ago, China played a greater part in Western life than the West did in China.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today is still colored and a bit befuddled by this inheritance from our own past.

The Europeans' discovery of Asia by sea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revolutionized their view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great sea voyages, and except for the brief contact with Cathay^① in the time of Marco Polo, the only other contemporary society known to Europe had been that of the Muslims and Turks, the infidel on the border of the known world against whom medieval Christendom had struggled. Eve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Europe there were still more books published on the Turks than on the New World. But the discovery of mighty kingdoms and ancient societies in Asia which were non-Christian and had actually survived for

① “Cathay”即契丹,指称中国。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向西方介绍元帝国时,就用“Cathay”一词指称中国,这个词代表了强盛、自豪、宽容的中国。



centuries without benefit of Christianity eventually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Western thought.

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new facts was fully developed only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lightenment. In it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ural morality and revealed religion came to a head. And China was taken a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the deity could be found through the natural order without revelation. The favorable picture of Cathay so brilliantly sketched by the Jesuit lett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from Peking tended to show that virtuous conduct, in many ways adequate to Christian standards, could be achieved without revealed religion. This afforded a basis for the separation of morality and religion as sought by the Enlightenment.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Latin at Paris in 1687 provided textual evidence. Writers like Leibniz, who had already bee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ina, asserted that the Chinese were actually superior in the prac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ir societ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its affairs, even though Europe remained superior in theoretical studies. For a generation which sought to show how the natural law underlay human institution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religion, China provided a perfect answer. In the China portrayed in the classics, a philosopher-king indeed appeared to be the benevolent father of his people.

Among the writ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Voltaire gave enormous prestige to Chinese government by his discussion of it in his *Essay on Morals* published in 1756. He stated that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China was "morality and law." The Chinese officials were benevolent guardians of the people, the whole kingdom a family, and the public weal the first duty of government. As evidence of this he pointed to the Chinese officials' concern for public works, roads, and canals, and other activities fostering economic prosperity. He pointed out

向欧洲传递中国形象、帮助大众建立中国观念的主要是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文本。尽管当法国启蒙思潮兴起之时,耶稣会士的影响力已江河日下,但依然需要借助他们的著作来了解中国。即便是欧洲使团的笔记,也喜欢引用耶稣会士的著作,把他们作为中国知识的权



威。伏尔泰提倡以“道德”代替宗教,倡导理性道德,明显带有理学影响的痕迹。

that the laws not only punished crime but also recompensed virtue, as when the emperor honored virtuous persons.

The Physiocrats^① in seeking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on in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also got inspiration from China. As prophe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middle class, the Physiocrats stressed the inviolability of private property. In their reaction against mercantilism they argued that the private individual should be able to accumulate wealth without government supervision. The leader of the Physiocrats, Dr. Quesnay, who was known as the “Confucius of the West,” published his book *The Despotism of China* in 1767. He argued that the emperor of China, although an absolute monarch, rul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ural law. Chinese society approached Quesnay’s idea of perfection. There was no hereditary nobility. The son succeeded to the goods of his father but could succeed to his father’s dignity only by study and self-improvement. China seemed to him a deistic society which worshiped the Supreme Being. Property rights seemed well assured. Taxes were regulated by the emperor and no lands except temples were exempt. Quesnay did observe that commerce was not sufficiently encouraged and that corruption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the despotism of the ruler were only partly tempered by fear of rebellion. But on the whole his estimate was favorable and had wide influence.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lso had a vogue of chinoiserie, the use of Chinese motifs in art, architecture, landscape gardening, ceramics, and other household furnishings such as wallpaper and latticework. Blue-and-white Ming porcelain, both imported and imitated, graced the

① 重农学派(The Physiocrats)是18世纪50至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视农业,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阐释。



mansions of the well-to-do. Chippendale furniture and Wedgewood china used Chinese patterns.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reached its height in the ten-story pagoda built in Kew Gardens in 1763.

China's impact on early modern Europe was thus highly selective, mediated through thinkers and craftsmen who found in the example of China certain things that they wanted to find. This set a style that still persists among travelers who take to China, prefabricated, their later impressions of the pla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secondhand idealized view of China held by the Enlightenment was rudely shattered by the maledictions of treaty-port merchants and consuls not interested in philosophy.

The Tribute System

During a full century, from 1842 to 1943, China labored under the handicap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by which she was opened to Western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enterprise. Although the unequal treaty system was finally abolished before the Communist victory, it still meets the need for a focus of patriotic resentment in retrospect. National disas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he Civil War or the Great Depression, have commonly been utilized in the appeals of domestic politics; so the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have found the treaty system a valuable symbol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Chiang Kai-shek, in his book *China's Destiny*, attributed to it all modern China's ills —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 and the Communist denunciations are even more vigorous and comprehensive.

To understand the one-sidedness and inequality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which the Western powers imposed upon the Chinese empire, one must look at the ancient tribute system which China first imposed upon Western visitors. This old

1748 年乔治·安森 (George Anson) 的《环球旅行记》是对法国耶稣会士建立的美好中国形象的第一次全面攻击,从此中国的形象逐渐走向负面,它贫穷、落后、愚昧的图景占据了 19 世纪欧洲人的意识。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美国史学家在解释 19 世纪的中国历史时,往往借助“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概念。

19 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方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中国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其中的原因很复



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他国必须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在这一问题上,“天朝”绝不肯通融。因而,礼仪问题成为中西邦交的巨大障碍。

以上回顾了以华夏为中心的朝贡制度的由来。

Chinese system was just as unequal as the treaty system that supplanted it.

The tribute system was an application to foreign affairs of the Confucian doctrines by which Chinese rulers gained an ethical sanction for their exercise of political authority. Just as the virtuous ruler by his moral example had prestige and influence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 so he irresistibly attracted the barbarians who were outside the pale of Chinese culture. To a Confucian scholar it was inconceivable that the rude tribes of the frontier should not appreciate China's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therefore seek the benefi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ce the emperor exercised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 rule all mankind, it was his function to be compassionate and generous to all "men from afar." The imperial benevolence should be reciprocated, it was felt, by the humble submission of the foreigner.

Once the foreigner had recognized the unique position of the Son of Heaven it was unavoidable that these reciprocal relations of compassionate benevolence and humble submission should be demonstrated in ritual form, by the ceremonial bestowal of gifts and of tribute respectively. Tribute thus became one of the rites of the Chinese court. It betokened the admission of a barbarian to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Kingdom. It was a boon and privilege, and not ignominious. As the original Chinese empire spread its influence through the centuries, over the rest of East Asia, the formalities of tribute relations were developed into a mechanism by which barbarous regions outside the empire might be given their place in the all-embracing sinocentric cosmos.

When Europeans first came to China by sea these formalities were naturally expected of them.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ed statutes of the Manchu dynasty, a tributary ruler of a foreign state should receive an imperial patent of appointment